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敵意的政治經濟來源：台灣與中國關係 1975~2005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4-H-160-002-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計畫主持人：賴文儀

計畫參與人員：-99：賴文儀  
此計畫無其他參與人員：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年10月09日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敵意的政治經濟來源：台灣與中國關係 1975~2005  
NSC 96-2414-H-160-002  
賴文儀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 前言

為了尋找促成戰爭與和平的系統性原因，學者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建立「事件資料庫」。這種事件資料庫方法，以時間序列統整所有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與合作，並且以嚴重程度給予特定分數，最後利用資料庫與統計方法來找出系統化的造成戰爭的原因。在本篇研究計畫之中，我將以事件資料庫的建立當作是最重要的課題，並且以這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兩岸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並試圖找出造成兩岸對立的政治經濟原因。

## 研究目的

在這個研究計畫當中，我的主要研究問題就是：如何解釋台灣對中國投射敵意的變化？我將檢視國際關係領域內已經存在的解釋方法，評估他們的實用性及完整性，並且提供我所認為最能抓住現實的解釋方法。這個抓住現實的解釋方法，必須有系統性的變化並且明顯的影響兩岸敵意的上升以及下降。我將在研究本文中提供現實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國內政治學派對台灣對中國敵意變化的解釋，然後我將根據這些學派提出各項假設（Hypothesis），以計量經濟方法分析自變數（導自各項理論假說）與依變數（兩岸敵意之變化）之間的關係，最後我將提供歷史回顧分析的方法，來闡述我的迴歸分析結果。

## 文獻探討

在這個部分，我結合國內外國際關係理論界對兩岸關係的分析與見解，來產生各項假設，這些假設將成為本研究計畫中最主要驗證的對象。以下簡略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國內政治學派進行介紹：

### 1. 古典現實主義

「中國與台灣 52 年來的權力鬥爭未曾停歇，不過雙方實力消長有所變化，因此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消長有所變化。因為權力平衡出現缺陷時，危機就會產生，因此台灣實力的上升又或者中國實力的下降將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上升，反之亦然。」

這個解釋方法的優勢在於簡單明瞭，而這也一向是古典現實主義的優勢。試想，我們不用去理會 52 年間中國與台灣內政的複雜變化，領導人的更換，國際局勢的更替，只要心中瞭解在它們之間就是權力掙扎，而變化的判準就是彼此實力。放到歷史事實上來看，當蔣介石部隊剛撤退到台灣來時，雙方野戰兵團的數目相當，國民政府的武器有美方援助，因此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所以在 50 年代初期，台灣的國民政府一直計畫在東南沿海登陸反攻，在韓戰期間蔣介石也曾致電麥克阿瑟表示希望出兵前往韓國戰場幫忙。爾後中共統一全國，整編人民解

放軍，建立完整國家機器，擁有巨大土地人口資源的中國使得台灣當局在 60 年代之後「反攻大陸」成為政治口號。由此可知雙方權力的消長確實影響到台灣能夠對中國展現的敵意。不過這個解釋方法也面臨多項理論性的挑戰。第一，正如古典現實主義一向為人詬病的，兩岸彼此的目的都在權力，而彼此實力消長的手段也是權力，手段與目的變為一物，那權力掙扎的賽局就沒有開始沒有結束，也不知道什麼是原因，什麼是結果。第二，權力超越對方是權力掙扎的目的，而權力平衡是權力掙扎者的非滿意結果（希望超越對方），那這個「平衡」要如何解釋變化的敵意呢？「平衡」不應該是升升降降的啊！如同我一再強調的，不變化的解釋因素不能解釋變化的敵意。第三，當中國實力上昇時，台灣是因為要繼續權力鬥爭而升高敵意，還是要因為畏懼中國而降低敵意？用現實主義的用語，台灣是要平衡變強的中國（Balance）？還是要順從變強的中國（Bandwagon）？我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只有在雙方實力已經懸殊的情況下，中國的上升實力才會造成台灣的順從，因為台灣將體會平衡的不可能性，而選擇順從。換句話說，當中國超越台灣實力過了一個頂點之後，台灣應該會對中國開始順從。由此答案，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兩岸關係並不是「單純的」權力掙扎，如果彼此實力消長的幅度過大，也會影響「權力掙扎—敵意」的因果方向。

## 2. 結構現實主義

「當國際局勢對台灣有利時，也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升高，或者是蘇聯對中國的支持降低，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升高。反之亦然」

這個假設明顯的遵從了結構現實主義的三大基礎：結構影響力，理性評估與國家追求生存與權力。我們要先瞭解，國際局勢對台灣的敵意程度有不能忽視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在軍事上，經濟上，人口上，資源上都完全不是能與中國對抗的小國家。國家尋求生存依靠內在增強與外在盟邦，分析台灣如何有膽對中國有敵意時，外在盟邦是關鍵的因素。這也是結構現實主義在解釋兩岸問題的優勢之處。結構現實主義對台海問題的假設一向廣為華府策士及美國的台海問題專家所採取。我們在很多政策建議的文章中可以發現，華府對台的政策往往是「一方面提供台灣所需來確保台海安全，另一方面對台灣明確表達不支持其尋求獨立的企圖」。這個政策背後的邏輯就是，如果幫助台灣，讓台灣感到安全，感到國際局勢一片大好，台灣就會進行超高敵意的台獨運動惹惱中國。」這完全符合上面假設所說的「對台灣支持上升，台灣對中國敵意就會上升」的邏輯。另外華府對北京的政策也是一樣：「向北京表示支持一個中國，美國不會介入中國內政，不過，台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這跟從同一個邏輯，「如果中國覺得美國支持中國統一，美國不會軍事干涉兩岸關係，中國就會升高對台敵意，解放台灣。」不過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方法有二個問題，第一個是外在影響力分析的範圍問題。第二個是在實證上與兩岸關係的歷史有所矛盾。第一，根據結構現實主義的假設，美蘇雙強在東亞的影響力應該左右台灣能夠對中國施放敵意的程度。不過如果我們將這個東亞政治局勢擴展到美蘇之間的關係，甚至歐洲與日本與美蘇的互動，故事又會不一樣了。首先，理論上，美蘇之間關係的緊張與否不會影

響到台灣對中國的敵意變化，因為上層敵意（美蘇）的同步變化不會影響到下層（中台）個別單位的敵意變化。不過，美蘇實力的消長就會影響台灣敵意的變化。如果美國在與蘇聯的權力掙扎之中佔上風，那台灣也搭著順風車在與中國的權力掙扎中佔上風，對中國的敵意就會上升。矛盾點就在這裡，如果上層和下層的變化不均等，如美國對蘇聯佔上風，而台灣對中國佔下風，那台灣對中國敵意要上昇還是下降？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權力結構變化之時，如 1989 年蘇聯消失在東亞權力版圖之後，上層與下層體系分析如何繼續？第二，放在歷史事實上來評量，結構現實主義對兩岸問題的假設在美國低盪政策開始之後就失去解釋的強度了。美國在極盛的 50 與 60 年代，確實是給了台灣極大的信心對中國叫囂高昂的敵意，蔣介石也一再請纓出兵，不過美國在越戰之後 70 年代的政經衰退，卻不見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消滅。台灣在軍事上不斷演習，增兵，購買武器，在政府對「匪」言論中未見退怯之處。台灣對中國敵意的降低一直到蔣介石繼承者蔣經國晚年才實現，而那已經是象徵美國正式不支持台灣（斷交）的十年之後了。另外一邊，從蘇聯的影響力來看，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測更是不精確。理論上說來，蘇聯對中國的不支持會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上升，因為那象徵了中國實力的下降。不過在歷史記錄中看不出蘇聯在中共建國初期的鼎力相助有造成國民政府任何敵意的下降，60 年代之後中共與蘇修分家，也沒有讓台灣原本就已高昂的敵意更加衝頂。是什麼原因？造成結構現實主義解釋方法的缺陷？我想目前我能回答的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我的檢視方法並不正確，我不能用經過篩檢的歷史事實來否認假設，正如我之前所呈現的，現實主義的假設對或錯都有成堆的歷史事實可以申論。第二個，我想敵意到底在自身強大時會升起，還是在自身衰弱時掙扎奮起？這個問題在接下來的防衛現實主義與攻擊現實主義的討論中獲得更深的分析。

### 3. 防衛現實主義與攻擊現實主義

我對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都面臨了一個主要的疑惑：台灣在實力上升時（包括自身實力的加強與結構因素的援助），會為追求更多權力而升高敵意還是會因獲得安全感而降低敵意？換句話說，在中國實力上升時，會導致台灣的挑戰還是示弱？現實主義家族中也面臨了這個問題。防衛現實主義與攻擊現實主義皆繼承大部分家族中長輩的前提與命題，尤其是 Waltz 對結構力量的重視。這兩個現實主義支派目的在於修正現實主義在解釋與預測世界政治時所遇到的邏輯問題。以下我以兩家理論針對台灣敵意的主題進行假設製造。Waltz 與 Van Evera 為首的防衛現實主義申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追求的是安全（這近似於 Waltz 所定義的「生存」），因此結構對國家影響的關鍵因素不是權力，而是威脅。國家會在承平時對可能發生的威脅採取行動，最後的目的是自身的安全，國家武力的目的是自我防衛，而非佔領侵略。這個邏輯就可以清楚的解釋為何霸權國家不會也沒有持續侵略活動，即使理性的分析之下侵略是划算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是傾向於靜態的，因為威脅沒有出現之際，國家們已經享有安全，不需去擾亂平衡。由此邏輯，我們可以導論防衛現實主義對台灣敵意

變化的假設應該是：

「當台灣實力上升時（包括自身實力的加強與結構因素的援助），或者中國的威脅下降時（包括自身實力的下滑與結構因素的削弱），台灣將會降低對中國的敵意，因為在兩種情況下，台灣已經達成安全的目的。反之亦然。」

老現實主義者 Mearsheimer 與新近的 Zakaria 為首的攻擊現實主義申論他們是跟隨「正統」現實主義的路子，堅持國家會理性考慮，衡量得失，瞭解對自身有利之後，向外輻射國家權力，並積極獲取更多權力。他們認為，因為所謂的國家安全極難衡量，要殲滅敵人於我們的岸上，海上，還是對方的港口，對方的家中？攻擊現實主義說，家中，因為這樣自身的安全才有最高的保障。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他們堅信。攻擊現實主義幫助現實主義解釋了權力平衡體系中「變動」的因子。事實上，若是國家沒有對外獲取權力的意圖與行為，那歷史上的戰爭就都是「意外了」？一定有國家先攻擊，才有國家去防禦，攻擊現實主義認為前者為強國政治主流，也是分析國際結構唯一重要的中心。由此邏輯，我們可以導論防衛現實主義對台灣敵意變化的假設應該是：

「當台灣實力上升時（包括自身實力的加強與結構因素的援助），或者中國的威脅下降時（包括自身實力的下滑與結構因素的削弱），台灣將會增加對中國的敵意，因為在兩種情況下，台灣有更大的機會獲取更大權力。反之亦然。」

自由主義

經過了半世紀的相對弱勢，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藉由世界政治上充滿前景的變化（如冷戰的和平結束，蘇聯與中國的和平解體與開放，歐盟的建立，世界經濟的互相依賴與融合，國際組織的蓬勃與擴張），重新站上國際關係學界的主講台。這種變化，正如同現實主義在大戰之後崛起的過程相仿。政治學中的大理論雖然總是宣稱自己跨越時空的解釋性與實用性，但是觀察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興衰，不免覺得仍然是一時一地的政治現實在主導理論。自由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一直是扮演「制衡」現實主義的角色。這樣說並不代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者理論南轅北轍，事實上，當代國際關係學者已經同意，在數十年的辯論討論之後，這兩大學派享有的共同點比差異點更多。(Kegley 1995, Baldwin 1993) 它們都相信國際關係本質為無政府與人為理性這兩大前提，在其他前提與命題中，自由主義傾向部分同意或修正性同意，以下簡述之。第一點，自由主義對人性與人類由經驗學習的能力比較樂觀，當然這不代表人性本善的天真想法，吾寧說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本惡的特性可以被克服，世界政治可以透過努力來改善。第二，不只國家為國際政治主體（如結構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其他在國際政治上縱橫的行動者如國際組織，跨國機構，也能發生影響力。第三，自由主義相信，不只國際上非國家控制的組織有影響力，在各個國家內的制度組織也都有對國際關係重要的影響力。第四，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可能的，有益的，應該推動的，而這也是解決世界政治問題的處方。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推論自由主義已經承認現代國家體系確實是造成國家們對合作不那麼熱情，所以才要非國家組織及國內制度來製造合作的契機，由此可見，自由主義對現實主

義若干的修正與抗議，是有前後連貫的邏輯性。總的來說，我們必須清楚的瞭解自由主義不是理想主義，不是蒙著眼睛的學者，跟現實主義比較，它同樣承認戰爭衝突的發生，它同樣承認人性有惡毒的一面，它同樣不認為道德與價值在國際關係中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它同樣自私的渴望追求福祉，它同樣畫地為線的堅持國家利益，它只是與現實主義追求的方法不同。由於在基本前提命題的些微不同，自由主義發展出很多與現實主義不同的理論，不同追求福祉的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這些不同點，將在下面延伸成為與現實主義截然不同的假設。我為了切合本論文研究主題，將自由主義分為「商業自由主義」與「機構自由主義」。在提供兩個門派的假設之後，我將加上現實主義的反證假設。雖然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末衰退，負隅抵抗的論證亦有可觀之處。

### 商業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中的主流學說一直是在三個基礎中進行，它們是促進商業交流，推動民主政治與壯大國際組織。Keohane 與 Nye 在 80 年代開始提倡「互相依賴理論」，90 年代的「民主和平理論」，直到 Russett 和 Oneal 與其他自由主義學者在 2000 年開始總和的「康德三角理論」，都是繞者這三個基礎相互良性增長。自由主義的三個基礎各自有不同的解釋方法與假設，我在這裡將促進商業交流定位在「商業自由主義」，而推動國內民主政治與壯大外在國際組織兩項，我把他們定位為「機構自由主義」，因為它重視國家內與國家外的機構的功能。首先討論商業自由主義。德國的 Kant，美國的 Paine，英國的 Cobden 在歷史上為商業自由主義的肇始者，也是現代學者討論商業自由主義時必定提到的祖師爺。事實上在經濟學的 Adam Smith 與 David Ricardo 有都提供了國與國之間商業交往對人類整體福祉的提升。作為提升經濟福祉的動因，商業交流的功能已經獲得大多數學者的同意以及實證研究的證明，不過商業交流作為防止戰爭，減低衝突可能性，與減緩國與國之間敵意的動因，連篇的辯論還在延續中。商業自由主義的學者如 Russett 與 Oneal 以實證研究支持商業交流促進國與國之間和平的假設，他們對這個關連性的解釋是基於兩點，一為互相依賴，二為交流瞭解。國與國之間的商業活動，包括貿易，投資，資金流動，如果幅度夠大，會直接造成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並間接的造成兩方社會文化的交流與瞭解。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將會降低人民與主政者對發動與商業交往國衝突的可能性，因為衝突與戰爭必定傷害商業利益，不只固定的資產與投資，也包括日日在進行的商業交易。而另一方面，商業交流也會潛移默化原本不熟悉的雙方人民，藉由這種瞭解與分享，戰爭不會在互相瞭解並信任人們中發生。另外一點，商業自由主義者也相信，國家經濟的成長會讓它發動戰爭的可能性降低，因為成熟的經濟體不願意讓戰爭破壞辛苦建立的經濟成果。當然，商業自由主義遭致眾多批評，來自理論上，也來自實證研究上。本格現實主義者 Greico，基於「相對所得理論」，認為參加商業交流的國家都必然會考慮到自己的所得是否比對方多，這個考量使得真誠的合作與互信變的不可能。這個考量也使得與他國的商業交流成為增加自身權力的方法之一，互相依賴是危險的，要避免的，互相瞭解並喜愛對方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有猜疑和

妒忌。Barbieri 的研究發現在所有的商業活動中，不均等的商業關係是危險的，甚至會造成衝突。(Barbieri, 1995) 由歷史上看來，帝國主義可以說是極端的例子，所謂的「戰船貿易」能夠帶給落後國家的，恐怕不是喜極而泣而是百年的仇恨。晚進的 Dependency Theory 也解釋這個中心與邊陲不均等的商業關係造成邊陲地區的長期貧窮落後，我們一樣不能期望受到經濟上壓榨的國家會對「大量貿易」的對象進行互信瞭解，並且降低敵意。那麼均等的商業關係呢？不，沒有，在現實主義者的眼中，所有商業關係都是「潛在」的不均等，這不是事實有沒有發生的問題，是人們心中的恐懼超越了互利的可能性。Mansfield 與 Gowa 也否認商業活動降低敵意的說法，他們認為對安全的考量是國家的首要選擇，對安全的渴求，將超越商業利益對國家的牽絆，那就是為什麼國家傾向與盟國進行自由均等的貿易，因為對安全的考量與被佔便宜的可能性較小。Katherine 與 Levy 甚至在研究中直接挑戰貿易降低敵意的預設邏輯：如果戰爭不會停止貿易，那貿易如何防止戰爭？Lieberman 總結現實主義對商業自由主義的總攻擊，那就是，安全的考量與相對所得的考量使的國與國之間的商業交流無法對降低敵意，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做出貢獻。最後，國家經濟的成長會不會降低其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呢？會不會降低對他國的敵意呢？現實主義者的批評又回到我們之前所討論的。現實主義者的答案是不會，因為經濟的成長代表實力的增加，實力的增加代表提高敵意的本錢，發動衝突的籌碼，國家們樂意之至。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得知，商業自由主義的每一項假設都與現實主義陣營的說法相反，以下我以台海兩岸的關係來訂立商業自由主義的假設群。

「當台灣與中國的商業交流增加的時候，兩岸相互瞭解加深，而互相依賴的程度也更高，以上這些現象，都會降低台灣對中國的敵意。」

「當台灣經濟成長，經濟成果將牽制台灣政府提高可能導致衝突的敵意，也就是台灣對主要威脅—中國，的敵意會降低。」

現實主義對商業自由主義的反對立場讓我產生以下兩個假設：

「當台灣對中國的商業依賴加深時，將會增加台灣對中國逐漸控制其經濟命脈的疑慮，也就是，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會增加。」

「當台灣經濟成長，台灣將有更多權力對中國表達敵意，因之，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會增加。同樣的，當中國經濟成長時，也會讓台灣感到自己的實力被逼近，被超越，被拉大差距，因此會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增加。」

### 機構自由主義

解釋機構自由主義，我們可以用簡單的邏輯推論延續商業自由主義的假設，雖然商業交流可以降低敵意促進和平，那如果國與國之間因為商業交流而產生摩擦，要如何解決？自由主義的信念，人的理性可以讓衝突往良性的方向前進，國與國應該坐下來討論摩擦的事宜，並且尋求解決之道。如果這種提供國與國交談、協商、討論的機制可以制度化，日常化，那國與國之間不必要的誤解與衝突就可以有比較大的機會獲得弭平。機構自由主義由此命題出發，申論一方面在國際關係中，跨國的組織與國際規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是促進國際和平與推動人類福祉的解方，因此加入並參與國際組織，認同國際社會，與多數國家建立密切聯繫，是減少衝突機會的主要方法。(Keohane 1984, Krasner 1983) 另一方面，在國內的機構，如果能提供發動敵意的與反對發動敵意的團體一個協商的機制，國與國之間衝突的機會也會降低。這種國內協商的機制，簡言之就是民主共和的政體，讓國民彼此間的內在爭論可以有討論並且和平落幕的空間，由此降低國家整體對外發動衝突升高敵意的動因。民主和平的理論在機構自由主義旗下算是近年來的顯學，相當多的自由派學者鑽研其中，而且在實證研究裡獲得很大的肯定。(Russett and Oneal 2000, Bueno de Mesquita, Morrow, Siverson, Smith, 1993) 現實主義對機構自由主義的批評仍然集中在最基本的前提上。第一點，現實主義堅稱國家以安全議題為至高無上的考量，其他都是次要的，可有可無，只要不傷害到國家的生存與安全。參不參加國際組織與認同國際社會，可以討論，只要在優缺點考良知後，對國家有利的就參與。不過安全與合作是兩碼子事情，國家只要遇到安全議題，就不能也不會對任何侵犯主權的要求讓步。第二點，國家參加國際組織與認同國際規則是和平的產物而不是和平的原因。然而，因為機構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實證研究上的成功，加上二十世紀末方興未艾的跨國合作趨勢，使的現實主義陣營對機構自由主義的批評軟弱無力。現實主義實在是無法去否認，或忽視機構自由主義在實證研究上得到的勝利。因之近年來，現實主義的抵抗都是跟隨著自由主義的假設來進行否認，而目前並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來與自由主義抗衡。接下來我以機構自由主義的理論，外在機構與內在機構，為台灣對中國的敵意變化作假設。

「當台灣參與更多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大量互動，或者更關鍵的與中國有協商機制時，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下降」

「當台灣的政體向著民主化前進時，開放的社會與公民積極參與政策討論會使台灣對中國的敵意下降。或者，當中國向民主演變之時，基於民主和平的認同，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會隨之下降。」

現實主義對以上兩個假設的看法都是兩者不相關，沒有因果關係。現實主義的反動假設為：

「因為中國認定台灣為中國的一省，因此台灣與中國在國際社會長年來相互競爭國際的承認。由此，當中國參與更多的國際組織，增加與國際社會互動之時，台灣會相對的感到不安全感，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威脅，因此，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會上升。」

#### 國內政治學派

國內政治學派離開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辯論，成為不同的面向解釋，因為國內政治學派的注意焦點在國內。自由主義相當重視國內政治，防禦現實主義也從不忽視國內政治，不過對他們來說，國內政治都是附屬於國與國關係的，國際關係的主要學者甚至認為鑽研外交政策根本不能說是「理論」，因為缺乏簡單與放之皆準的解釋力。Waltz 對外交政策分析的「看輕」其實是有他的道理。每一個國家都有截然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經濟狀況，人口分佈，如果要



將所有的因素加以分析來瞭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那這種研究確實是只有一時一地的侷限性。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互動，其消長，若是沒有一個共通的前提與理論架構，國際關係就不該稱為政治科學而應該是區域研究甚至是一國之內政研究。矛盾點就在此，當我們試圖去瞭解千頭萬緒的研究問題時，忽略或無視個體政治人物與個別國家內政，將會導致整個研究圖像的模糊與不實用，這一點也是Waltz所肯定的。我們對國際關係大理論與國內政治研究之間的關係，應該持著互補互助的觀念。我們以大理論來看大局勢，以對細節的瞭解來補強對大局勢的解釋，常常我們發現，這也是國內政治學派所專注的，大理論在很多國際事件上的解釋力是弱的，甚至是錯的，不過大理論的用處就在這裡，當我們發現大理論的缺失時，我們才細心去看其他面向的解釋方法。我把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當成標準尺規，去衡量不同的物體，當我發現尺規無法給我正確有用的度量時，我去研究物體本身是不是非常態易變的，使用尺規的人是不是偏見，使用方法是不是錯誤，使用當天的其他變因是不是影響尺規的正確度。沒有了尺規，我們就沒有基本的度量衡，只相信尺規，我們常常得到錯誤的訊息。一如在國際政治的研究，沒有大理論，我們置身黑暗中，沒有細節的探討，我們會得到錯誤的或者不完整的結論。國內政治學派的研究大都專注在小數目的個案或者單一個案，它們大都試圖以國內政治的因素取代外在影響力，並申論他們的因素才是決定性的。在各種研究中，因素包羅萬象，小從領導者的個性，大到國家百年歷史的傳承，以下是在領域中比較突出的因素，也就是說這些因素的解釋力比較廣。他們是意識型態的歧異（Goldstein, 1989），政黨政治的對立（Burnham, 1970），地理區域的分別（Trubowitz, 1998），產業分工的分佈（Ferguson, 1984），與政治結盟的形成（Jack Snyder, 1991）。最後一個政治結盟的形成應該說是總結其他因素的複合體，因為政治行動者或團體結盟的原因可能基於經濟，理念，區域等等，通常當其中沒有因素的影響力特別顯著時，學者就採取複合的「政治結盟形成」作為解釋方法。要分析這些因素為主的研究，我們必須以個案內容與歷史事實去評估它們的解釋力，因為個案與個案之間的差異性太大。因此在這裡我將不會討論其他個案其他國家，我將專注於台灣敵意變化這個中心。

## 研究方法

接下來我直接將預設模型列出：

1. 互相敵意模型：中國對台灣的敵意的變化造成台灣對中國的敵意的變化。

$$H_t = \alpha + \beta_1 C_t + \beta_2 C_{t-1}$$

其中， $H_t$ 是指台灣對中國的敵意， $C_t$ 是指中國對台灣的敵意， $C_{t-1}$ 則是事件資料庫中上一個時期中國對台灣的敵意。這個模型實際上在測試台灣對中國與中國對台灣兩個事件資料庫是否互相影響，加入上一個時期的中國對台灣敵意是因為在理論上，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有時候會造成台灣馬上的敵意回應，有時候卻需要時

間造成回應，我沒有要一一追究每個確實回應的狀況，只是假設台灣對中國敵意應該會被不只當前的中國態度影響也會被上個時期的所影響。在這裡，我的假設是，中國本期以及上一期對台灣投射的敵意上昇，將造成本期台灣對中國敵意的上昇。

2. 兩岸差距模型：台灣與中國在經濟實力上，文化型態上，政治制度上差距的變化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變化。

$$H_t = \alpha + \beta_1 C_t + \beta_2 C_{t-1} + \beta_3 (G_c - G_t) + \beta_4 (P_c - P_t) + \beta_5 (E_c - E_t) + \beta_6 (D_c - D_t)$$

其中新加入的三個自變數， $(G_c - G_t)$ 是指中國與台灣在國民生產毛額的差距，代表兩國整個經濟國力的差距的加大會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加大，這個概念是將兩國視為一整體看差距對敵意的影響。而 $(P_c - P_t)$ 這個變數代表中國與台灣在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差距，因為個人收入的差距更能細微的代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差距，而這個差距會對敵意造成影響，若是台灣人的收入超越中國人越大，敵意就會越大。 $(E_c - E_t)$ 則是指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的差距，經濟成長率是動態反映著一個國家的富裕成長，這個指數比國民生產毛額更能抓住一國經濟情況的變化以及國民對整體經濟環境的感受。兩岸的經濟成長率如果差距越大，不論是中國更好或者台灣更好，這個差距都會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增加。最後一個變數是 $(D_c - D_t)$ ，是指台灣與中國在民主化程度上的差距。如果台灣與中國在政治制度越差越遠，民主與專制，則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則會升高。在本模型中，仍舊留下 $C_t$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 $C_{t-1}$ ，上一個時期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是將它們視為控制變數。

3. 現實主義實力解釋模型：台灣的經濟軍事實力，或者聯合美國的經濟軍事援助之後，與中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差距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變化。另外，台灣在經貿上依賴中國程度的變化，造成對台灣實質的不安全感，也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變化。

$$H_t = \alpha + \beta_1 C_t + \beta_2 C_{t-1} + \beta_3 E_{t-1} + \beta_4 M_{t-1} + \beta_5 U_{t-1} + \beta_6 I_{t-1}$$

在本模型中， $C_t$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 $C_{t-1}$ ，上一個時期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是控制變數。 $E_{t-1}$ 是台灣在上一個時期的經濟實力，當上一時期的經濟實力上昇時，此時期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升高。在兩岸的例子中，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無法與中國抗衡，差距太大，所以我在經濟指數上採用經濟成長率，成長率可以代表台灣經濟實力的變化狀況，並且符合假設中的邏輯。 $M_{t-1}$ 則是台灣在上一個時期的軍事實力，當上一時期台灣軍事實力上昇時，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上昇。軍事實力必須包含台灣的軍事總支出，軍事人員數量，以及軍事採購量。再來的變數是 $U_{t-1}$ ，這代表了上一個時期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當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上昇時，下個時期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上昇。這個變數主要包含兩個面向，一個是美國實質上販賣軍事物資予台灣的數量，二個是美國在政治外交上對台灣的支持。這

個模型中最後一個變數， $I_{t-1}$ 是指台灣對中國上一個時期在經貿上的依存度，依存度越高，台灣對中國的懷疑越高，敵意就越高。經濟依存度的變數則特別關注在台灣對中國的貿易與投資佔台灣貿易與投資總額的比例，以及更深入對中貿易的入超對台灣經濟維持的比例。

4. 自由主義經貿解釋模型：台灣在中國的投資量與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量的變化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變化。

$$H_t = \alpha + \beta_1 C_t + \beta_2 C_{t-1} + \beta_3 V_t + \beta_4 V_{t-1} + \beta_5 T_t + \beta_6 T_{t-1}$$

$C_t$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 $C_{t-1}$ ，上一個時期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是控制變數。 $V_t$ 是台灣在中國投資的總量， $V_{t-1}$ 是上一期台灣在中國投資的總量，兩個變數並列因為根據自由主義理論前提，上一期台對中投資的增加會累積效果造成台灣對中國敵意的下降，而這一期的投資增加，也是來自於上一期的決策，所以也可以直接的降低這期台灣對中國的敵意。 $T_t$ 是台灣與中國貿易的總量， $T_{t-1}$ 是上一期貿易總量，這兩個變數的上升都會造成這一期台灣對中國敵意的下降。

5. 國內政治：台灣內部反中國與親中國兩大政治陣營敵消我長的實力競爭造成對中國敵意的變化。這個部分的實證研究將分成兩個模型，一個是產業結構轉變模型，另一個是親中反中競爭模型。

$$\text{產業結構轉變模型：} V_t = \alpha + \beta_1 M_t + \beta_2 A_t + \beta_3 R_t$$

$V_t$ 代表在特定選舉中，台灣全省各縣市選民投給反中陣營候選人的個別票數， $M_t$ 代表全台灣各縣市產業中傳統製造業的比例，越高的傳統製造業，就會在開放與中國通商之後導致更多的實質失業，則選民就會越傾向投票給反中陣營的候選人。 $A_t$ 則是指台灣各縣市中農林漁牧業所佔的比例，農林漁牧業在開放與中國通商之後面臨重大的進口品威脅，利潤急遽下降，因此 $A_t$ 的上升會連動 $V_t$ 的上升，農林漁牧業越昌盛的縣市，將越傾向支持返中國陣營的候選人。 $R_t$ 則是指台灣各縣市中與土地利益有關連之相關產業比例，因為開放通商中國之後土地價格大幅滑落，與土地價格有直接利益關係之產業從業人員將敵視中國因素，因此 $R_t$ 的上升會連動 $V_t$ 的上升。這個模型將測驗台灣產業受到中國影響的程度，並且試圖分類產業別為親中與反中。

$$\text{親中反中競爭模型：} H_t = \alpha + \beta_1 V_t + \beta_2 M_t + \beta_3 A_t + \beta_4 R_t$$

這個模型回到本論文要驗證的主要議題，以 $H_t$ ，台灣對中國的敵意，作為依變數， $V_t$ 是台灣各縣市支持反中國政治人物的比例，接下來的 $M_t$ ， $A_t$ ，與 $R_t$ 則是與產業結構轉變模型中三個自變數一樣，只是比例規模由縣市層級轉變為全國層級。當反中陣營政治人物得到更多支持，也就是背後有各產業變化為邏輯因素，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就會上升。

## 結論

以現有的數字資料進行回歸研究，有以下發現：如圖。研究成果證實，之前各項假設各自有不同的正確性。總的來說，現實主義的預測在兩岸關係上相對不準確，台灣與中國各自沒有在「權力競逐的框架之下進行鬥爭」。自由主義的預測也不夠準確，兩岸關係並沒有因為貿易與投資的擴大而更加和諧。反而是國內政治模式的預測較為準確：反中派與親中派的勢力消長直接影響台灣對中國敵意的投射消長。而這個親中與反中派的分野正式取決於台灣各區域產業結構之差別。

Theoretical Approach	Independent Variable	Dependent Variable	Sig.	Causal Direction	Period, Number of Obs
Realism	China's Hostility toward Taiwan (Ordered)	THCD1 (Ordered) THCD2 (Ratio) THCD3 (Count)	*** *** ***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1979~2004 312
	Taiwanese CINC (Index Number)	D1 D2	* **	Negative Negative	1975~2002 28
	Taiwanese Military Spending (Number)	D1 D2	** ***	Negative Negative	1975~2002 28
	CINC Balance Taiwan/China (Ratio)	D1 D2	** ***	Negative Negative	1975~2002 28
	Military Spending Balance Taiwan/China (Ratio)	D1 D2	no no	--- ---	1975~2002 28
	US Support to Taiwan (Count)	D1 D2 D3	no no ***	--- --- Positive	1989~2004 192
	US Arm Sale to Taiwan (Event)	D1 D2 D3	no no no	--- --- ---	Selected Events 33
Liberalism	Regime Type Differences (Ordered)	D1 D2	no **	--- Negative	1975~2004 30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Number)	D1 D2 D3	** * ***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1999~2004 72
	Cross Strait Trade (Number)	D1 D2	no no	--- ---	1978~2004 27
	Cross Strait Trade (Number)	D1 D2 D3	*** *** ***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1989~2004 192
Domestic Politics	Concentration on A/M 2000 (Ratio)	AC 2004 (Ratio)	***	Positive	23
	Concentration on C 2000 (Ratio)	AC 2004 (Ratio)	***	Negative	23
	Concentration on A/M 1995 (Ratio)	AC 2000 (Ratio)	***	Positive	23
	Concentration on C 1995 (Ratio)	AC 2000 (Ratio)	***	Negative	23
	Political Competition/AC Win (Event)	D1 D2 D3	*** ** **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Selected Events 39

\*p<0.1, \*\*p<0.05, \*\*\*p<.01

## 討論與建議

1. 資料庫的建立過程中，登陸資料的疏漏與主觀常常成為數據分析結果變異之主因。
2. 資料的疏漏與主觀有其系統性原因，其一，新聞來源不夠完整，中文資料區至今尚未有完整的兩岸對話紀錄，而且是較少主觀立場存在的資料記錄。在研究主持者帶領兩位學生的登錄資料工作之下，仍然有相當多的問題與遺憾，連帶的會影響到統計軟體計算之成果。
3. 可以相對驗證的指數不夠齊全。譬如台灣武器取得的資料相對有限，即使有，也無法以時間序列的方式做出有統計的顯著性。不只如此，即使是兩岸的經貿記錄，也幾乎無法回溯到1987年之前，許多指數的數據，最後都是不足以構成統計驗證的充分資料。
4. 登錄者主觀想法之排除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力的加入。主持人與兩位研究助理常常為了一個事件的定義問題相執不下，因為其實也沒有真正正確的答案。原本認為可以將整體事件數目字用大以洗刷偏見，不過後來發現既然個別爭論就花時間了，大量的資料庫又如何能建立起來？所以更多的時間與研究人力投入是必須的。
5. 針對兩岸關係部分，國與國關係的和平或戰爭，其實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般的鬥爭結果。一國之內的內政變化，往往是決定國與國關係的最重要變因。主權的爭執很嚴重，不過主權本身的定義可以調整，可以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求戰的惡魔之心長存領導者心中，不過卻一定是可以排除的。正確的內部政策與清明的外交政策制訂，一定會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佳和諧，同樣的定理可以應用在台灣與大陸之間。

### 參考書目

- Baldwin, David A.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arbieri, Katherine, Levy, Jack S.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Special Issue on Trade and Conflict (July 1999)
- Betts, Richard K.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 1994)
-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 Christensen, Thomas J.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 Doyle, Michael W.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Issue 4 (Dec. 1986)
- Eckstein, Harry "Regarding Politics: 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 Stability,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Ferguson, Thomas "From Normalcy to New Deal: industrial structure, party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public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1, (Winter 1984)

Fordham, Benjamin O.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Policy Changes: The Case of NSC 68"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17, 1, Spring 1999

Fordham, Benjamin O. "Building the Cold War Consensu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45-51"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Fordham, Benjamin O. "Economic Interests, Party, and Ideology in Early Cold War Era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2, Spring 1998

Fu, Jen-kun "Taiwa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Asian-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October 1998)

Goldstein, Judith "The Impact of ideas on trade policy: the origins of U.S.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 1, (Winter 198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rief Edition" rev. Kenneth W. Thompson, McGraw Hill Press, 1993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i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Kant, Immanuel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Kegley JR., Charles W.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adsworth Group, 1995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Lake, David A.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 86, No. 1 (March 1992)

Levy, Jack S.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Liberman, Peter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Economic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1 (Summer 1996)

Mansfield, Edward D., Gowa, Joanne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2. (June 1993)

Mesquita, Bruce Bueno de, Morrow, James D., Siverson, Randolph M., Smith, Alastair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4 (Dec. 1999)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Mearsheimer, John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Milner, Helen "Trading Places: Industries for Free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40. Issue 3 (April 1988)

Moravcsik, Andrew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Issue 4, (Autumn 1997)

Moravcsik, Andrew, Legro Jeffrey W.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apayoanou, Paul 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Issue 1 (Mar. 1997)

Pevehouse, Jon C., Goldstein Joshua S. "Serbian Compliance or Defiance in Kosovo?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al-Time Predi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Issue 4 (Aug. 1999)

Pevehouse, Jon C., Goldstein Joshua S. "Reciprocity, Bully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Bosnia Conflic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Issue 3 (Sep. 1997)

Rogowski, Ronald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ss, Robert 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Deterrence,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Fall 2002)

Ross, Robert 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Ruggie, John Gerard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s: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Issue 2, (Spring 1982)

Russett, Bruce Oneal, John "T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Schrodt, Philip A., Gerner, Deborah J. "Empirical Indicators of Crisis Phase in the Middle East, 1979-1995"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Issue 4 (Aug. 1997)

Schrodt, Philip A., Gerner, Deborah J., Francisco, Ronald A., Weddle, Judith L. "Machine Coding of Event Data Us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Issue 1 (Mar. 1994)

Snyder, Jack "Myths of Empir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Trubowitz, Peter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Tucker, Nancy Bernkopf “China-Taiwan: US Debates and Policy Choices” *Survival*, Vol. 40, No. 4, (Winter 1998-99)

Waltz, Kenneth “Political Structure” ed. Keohane Robert O.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9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ker, Thomas C. “The Forgotten Prophet: Tom Paine’s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0) 44

Whiting, Allen S.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